



西方思想塑造了 華人教會文化嗎？

林慈信

在華人教會事工及神學教育圈子內，常聽到教會領袖指某些觀念為「西方的思想」。言下之意，這些事工模式或神學思想乃源自西方，而亞洲的教會必須深思熟慮，以批判的眼光衡量這些觀念是否適用於東方的教會。

一、「西方」何所指？

「西方教會」是指使徒在羅馬帝國領域內，及教會在第一、二世紀在希臘文及拉丁文地區所建立之教會。從一般西方歷史觀點，所謂「基督教」可分為羅馬天主教、東正教及基督新教(Protestantism)。

二、華人教會裡哪些思想是來自西方？

我們必須承認，大多數的西教士都是帶著一股篤信、順服《聖經》及熱愛主耶穌基督的心到中國去的。這樣的心算是西方文化包袱嗎？當然不能這樣說！

不過，西方教會在信仰、教會制度或事工形式的著重點、方法等，的確反映著他們的歷史文化背景。我們試從六方面討論西方教會在華人教會留下的文化遺物。

1. 宣教的個人主義與開荒精神：歐、美宣教士多是十九世紀

30 及 60 年代兩次復興的果子。他們獻身到中國去，都帶著犧牲的精神，要到未聽過基督之名的地方宣講福音。這種獻身、開荒精神，包含著獨立思維與行動的傾向。這種精神值得敬佩的方面是：傳福音與開荒宣教，仍被華人(尤其是福音派)教會注重，被列為教會之首要任務。負面影響是：華人信徒往往未能學會犧牲小我，成全大我，以合一、合作精神完成大使命，建立地上的教會。我們所關心的，往往是自己的「地盤」，很少注意別人事工的需要。

2. 反理性及反文化之心態：

多年來，不少西教士帶到中國的信息是：這世界及其中所有的，必很快成過去。我們的使命是搶救靈魂，讓人從撒但的權勢進入救恩的領域。至於地上的需要，如福音如何改造文化、社會及思想等事，則沒有時間精力去理會了。這種反文化、反理性的心態造成嚴重的後果，一百多年來，中國及海外華人之神學教育素質差，直至二十世紀70年代華人教會領袖接管以前西教士經營的神學院後，才有顯著的改善。

3. 教會意識薄弱：1860簽訂〈北京條約〉後，數十西差會(包括宗派與非宗派的)紛紛差派宣教士到中國。他們比較關心的是拯救靈魂，及如何把宣教事工做好。至於宗派之間的分歧，往往被視為不重要，甚至是罪惡。這造成了長遠的不良效果：華人基督徒比較懂得要傳福音，要從事差傳，不太注意怎樣幫助教會在制度上、歷史及社會使命上有更成熟的自覺及表現。

4. 實務精神與功利主義：二十世紀70年代，福音派經過幾十年與自由派(及新正統派)神學的爭辯後，漸漸走上制度上較成熟的路，葛培理(Billy Graham)更於1966年在柏林(Berlin)召開宣教大會，更於1974年在瑞士洛桑(Lausanne, Switzerland)舉辦首屆洛桑宣教大會。在這些會議和與它們相關的宣教運動中，教會領袖常有這樣的預設：我們已經知道福音是甚麼，也知道《聖經》的教導。我們真正需要做的是盡快把福音傳到地極。這種實務精神可理解為一種福音派的功利主義，卻對教會有害。每一代信徒

與教會領袖，都需要重新思考福音的內容，進而訂出適合當代之宣教策略。《聖經》所教導的真理是絕對不變的，不過我們必須用我們的語言講述真理，並在我們的文化處境中應用出來。

5. 市場學與心理學觀念：50年代，美國工業起飛，汽車造得愈大愈好。這種「生長」或「膨脹」心態很快便出現在福音派的教會及宣教事工上。今天除了最基本的文字出版、電台廣播外，我們已用上廣告、電視、電郵及網際網絡等媒介來發展宣教事工。有時，形象會歪曲了真理，效率會犧牲掉《聖經》所宣講的教義。

量的增長，人數的增加，本來並沒有甚麼不好。神的意旨也是要祂在地上的國度質量都增長。除此以外，傳福音時的確需要顧慮到受眾全面的需要。不過，歪曲事實的真相，是媒體事工不斷面對的引誘。我們在工具與方法上的取捨，需有從《聖經》來的智慧，及批判的眼光。

6. 學術的專門化與專家的權威：在《聖經》研究及神學思想方面，華人教會圈子內常聽到「本色神學」或「處境神學」等口號。不過，從事《聖經》或神學方面學術研究之華人基督教學者，多在西方接受高等神學教育。相應之下，傳統華人教會反理性、反文化之影響漸趨薄弱。華人教會也漸漸意識到歷史回顧之需要；要建立華人神學思想與華人神學教育，必須同時整理在華宣教史、帝國主義與現代中國史等複雜問題。

與此同時，華人教會不知不

覺地採用了各種來自西方之神學方法論與神學思潮。這些神學思想不都符合正統《聖經》信仰。雖然華人神學界浮現的思潮不都純粹來自西方，不過建立這些思想模式之方法論預設，大多來自當代西方學術界。結果，華人神學院所教導的，與教會講壇所宣講的，不都符合正統《聖經》信仰。學術專家之權威，不知不覺地與《聖經》之權威等同。

這些新興的學術思潮包括下列這些：

(1) 全盤照收當代(後現代)詮釋學與語言學，應用在華人神學界之釋經上。《聖經》之固有穩定的原意是否存在，開始被學者懷疑。

(2) 某些《聖經》學者提倡嚴謹的《聖經》研究，其實言下之意，乃抗拒傳統(包括正統)之系統神學之研究。時常聽到的口號是：「讓《聖經》自己說話」(Let the Bible speak for itself)。其實背後的意思是：系統神學與教義對認識《聖經》只有害處，沒有益處。這樣一來，歷代教會對教義探索的成果(信條與系統神學)，很微妙地被擋置一邊。信仰根基日益衰弱。

(3) 在《聖經》研究中，學者往往採用最新的思想及工具(如女權釋經、後現代解構主義等)，結果是，在不少經文之詮釋上，撇棄甚至攻擊傳統(福音派)之詮釋立場。以前，傳統的福音派學者在釋經上總為傳統、保守之觀點作出嚴謹之辯護；今天的福音派學者，有意無意地系統性攻擊傳統、保守派之釋經立場。

(4) 在系統神學與信仰反省

上，多採用以人為中心、以經歷為中心，強調吊詭與「存在性」之方法。有意無意地，神學家棄絕傳統教義神學之預設。今天很多神學家不太願意認信《聖經》中有一套完整的、神所啟示的真理(教義)系統。今天的救恩論，傾向強調神與人之間的「情」或「相遇」，強調「和睦」與「醫治」，罪之嚴重及十字架之重要性日漸式微。

(5) 在神學與文化之「整合過程」(integration)中，學者不加思索地將十九、二十世紀之「知識社會學」各種思想、方法引進華人教會。這樣一來，文化研究有了學術基礎，不過《聖經》對文化應有之批判及重整被忽略了。

(6) 在佈道與護教引進儒、釋、道思想時，同時肯定了一種微妙的反理性主義。理性被看為「原罪」；用聖靈帶領之理性來研究教義真理，被視為西方希臘文化的包袱。有些學者頗欣賞老子或莊子的哲學；在建立華人護教神學之同時，把一種反理性主義及神秘主義也帶進教會來。這是「本色華人神學」嗎？

三、初步反省

究竟甚麼是西方的？甚麼是中國的？華人學者可能抗拒西方神學，但是他們往往用了西方學術之工具和預設來批判西方。

話說回來，任何民族或教會，都須學習順服那在《聖經》中曉諭的聖靈。身為教會僕人與領袖，神學家必須認信《聖經》都是神所默示，無謬無誤(infallible and inerrant)的。學者必須承認《聖經》是自我解釋的；《聖經》在學術與事工上，都是絕對足夠的

(sufficient)。

成熟的教會，是不會只批判西方教會的。我們需要學習欣賞二千年來教會歷史留下之寶貴遺產。這遺產裡面包括很多正統的、合符《聖經》的神學作品。至於當代的神學(及其他學科)方法論與預設，無論對我們有多大吸引，必須以正統《聖經》信仰立場探討、批判。

「本色」神學的起點是：《聖經》啟示的是甚麼？《聖經》是否提供了一套整全的、權威的真理？神在《聖經》裡有否作了「末後的曉諭」(參來一1、2)？

福音派傳統的信念是：《聖經》中教導我們一套教義真理。這裡所指的真理系統，不是某一派別的神學〔伯拉糾(Pelagius)或奧古斯丁(Augustine)、約翰加爾文(John Calvin)或雅各布斯亞米念(Jacobus Arminius)、聖約神學或時代論、福音派或靈恩派〕。我們必須相信，當我們以謙虛、信靠、順服的心研讀《聖經》時，便可以逐漸認識這套教義真理，而這套真理是以宇宙之創造者、救贖者、三一真神為中心的。我們可以信靠這套真理，認識這套真理，意即認識神，認識主基督。我們必須透過講壇、主日學、查經班等，用諸般的智慧教導、宣講、維護、愛慕、順服這套真理。這套真理即《聖經》教導的全部。教會要成熟，必須熟念《聖經》，宣講《聖經》，教授《聖經》。在東方如此，在西方也如此。

(作者為北美華人神學工作者，中華展望總幹事，本文原刊於《今日華人教會月報》2001年2月號)

讀者來函

多次閱讀 貴刊有關宣教的文章也使我心情澎湃，淚水不期然湧流，除了為宣教士們的擺上流下歡欣的淚水外，也為華人有機會在這末世的時期接起這棒子而灑下感恩之淚，更為自己未能在前線服侍而慚愧下淚。多次也曾想拿起筆桿給你們問候，並看看身在英國的我，有甚麼可為你們效命，卻礙於恐怕打擾而未敢揮筆。

最近拜讀十二月號〈教會音樂〉專輯，獲益良多，解釋了我多月來深藏內心的問號，也平伏了內心的掙扎。正值本會在探索主日崇拜及改變崇拜形式的當兒，

貴刊有如「及時雨露」，為此未知可否勞煩你們多寄五份給我，好讓我能與會內弟兄姊妹分享。

此外，本年2月是本會的宣教月，希望藉此推動教會上下一心參予差傳及宣教事工，深知一切也由禱告開始，相信 貴中心出版之《普世宣教手冊》一書，必能給予我們指引。

英國杜 妹妹